

包山楚简“贷金余种”问题的考察

王 准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包山楚简贷金简中关于贷金、余种等问题还存在一些疑问。通过对比发出命令的中央官员与签收贷款的地方官员的名单,从而确定贷金简中一共存在两次独立的贷款行为。这两次贷款的用途并不相同。借助对贷款黄金购买力、县级单位居民口粮消耗的推算,第一次贷款应该是用于购买粮食救济,第二次贷款可能用于为地方纾困。

【关键词】包山楚简;贷金;余种;楚县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1-0049-09

The Research on Grain Loans in Gold Based on the Chu Bamboo Strip Texts of Baoshan(包山)

WANG Zhun

(The Institute of Chu Culture,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WuHan 430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ans in Gold strips in Chu Bamboo strip texts of Baoshan (包山), some details of grain loans from government are confused. Comparing the list of officials who give commands and who sign for loans, peopl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Loans in Gold strips keep a record of two batches of loans. Some economic factors are estimated, such as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loans, grain consumption of a county. The purpose of first batch of loans is not the same as second one. The first batch is taken out for food, and the second batch is likely to succour the needy.

Key words: Chu Bamboo strip texts of Baoshan (包山);the Loans in Gold;grain;purchasing power; county of Chu(楚)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组竹简是记载了楚国令尹、司马等官员代表中央政权向地方贷出黄金的文书,后被学者称为“贷金简”^①。该组竹简共17枚(简号103—119),自从公布以来,引发了学界对楚国农业生产、金融制度的不少讨论,取得相当令人瞩目的成果^②。但贷金简中有关贷金、余种等问题还存在一些疑问,本文将对此再做一番考察,向各位学界专家请教。

【收稿日期】2015-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国秦代出土文献史料中的基层社会组织研究”(13CZS010)

【作者简介】王准(1980—),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楚文化与战国秦代出土文献研究。

- ① 此组简原本没有标题,罗俊扬《从包山楚简贷金史料论楚国之金融》(《金融经济》1997年第12期)中称之为“贷金简书”,罗运环《包山楚简贷金简研究》(《武汉金融》2005年第10期)称之为“贷金简”。本文将采用“贷金简”的称呼。
- ② 后德俊:《“余种”考》,《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罗俊扬:《从包山楚简贷金史料论楚国之金融》,《金融经济》1997年第12期;李学勤:《楚简所见黄金货币及其称量》,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王颖:《从包山楚简看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罗运环:《包山楚简贷金简研究》,《武汉金融》2005年第10期;张伯元:《为“越异之金”进一解》,简帛网2012年1月19日(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26)。

一、贷金的次数

贷金简虽然是内容相关的文书,但其内部还可以再细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简 103 至简 114),记录了楚国司马在享月命令襄陵公等人借贷黄金给鄢郢地区,用来“糴种”,其后是各地官员签领黄金的详情;乙组(简 115 至简 119),记载同一年夏柰之月令尹、太师等命令襄陵公为鄢郢地区贷出黄金,紧接的简文也是各地官员领取黄金的记录。

由于甲、乙两组记录的贷款时间非常接近(相邻的两月),而且两组中有一半左右的地方单位接收的贷款数额完全相同,以至于引发了贷金简讨论中的一个重要争议:甲组与乙组简文之间的关系问题。乙组简中的贷金活动究竟是对甲组文书的执行纪录,还是一次独立的贷款活动。这个疑问也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两组简文记载的贷款次数是一次抑或两次?

后德俊先生最早对贷金简进行专门研究,他认为,甲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间,某地的哪一些官员为某地计划所贷黄金的数量与用途”,乙组则是“为某地实际所贷到的黄金数量”^①。显然他认为仅发生了一次贷款,甲组为贷金的计划(尚未实现),乙组为贷款实际到账的记录。李学勤先生认为“贷金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春播前贷款各地”,“第二次贷金……时间已经在播种之后”^②。朱晓雪也认为“政府于高(享)月、夏夕两次贷金给各地”^③。但可惜的是后两位学者并未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过专门论证。

那么,贷款次数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呢?笔者赞同李、朱二位的看法,贷款共有两次。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有两个,详情如下。

第一,两组竹简中发出贷款命令的中央官员名单有很大不同。我们先来看看原简。

大司马邵(昭)鄢(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戡(岁)高(享)月,子司马以王命命襄陵公鬻、宜鄢(阳)司马强賁越异之黄金,以賁(贷)鄢郢以糴(余)种。【简 103】

大司马邵(昭)鄢(阳)败晋币(师)于鄢(襄)陵之戡(岁)夏柰之月庚午之日,命(令)尹子士、大币(师)子繡(佩)命襄陵公邾鬻为鄢郢賁越异之鏹金一百益(鎰)二益(鎰)四两。【简 115】^④

两枚简中,虽然接受命令经手的官员都出现了襄陵公邾鬻的名字,但发出命令的人已经完全不同:前者是司马,后者则是令尹与太师。假如只发生了一次贷款活动,考虑到贷款又是中央政府下达的行政指令,似乎没有必要更换不同的官员将命令重复下达。况且在前一月由司马下令贷款,后一月由令尹负责执行,也与以令尹为楚国政府最高职官的常识相悖。

第二,甲、乙两组简中,接收黄金的地方官员名单也有很大不同。详情可见下表^⑤:

① 后德俊:《“糴种”考》,《中国农史》1995 年第 4 期。

② 前揭李学勤文《楚简所见黄金货币及其称量》。

③ 朱晓雪:《包山楚墓文书简、卜筮祭祷简集释及相关问题研究》,2011 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 225 页。

④ 本文对包山楚简贷金简的文字释读主要依据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⑤ 两组简中都出现过的接收贷金的官员名以下划线标出。

政区名	接收贷金的官员(甲组简 103 至简 114)	接收贷金的官员(乙组简 115 至简 119)
鄢	莫器甕、左司马𠂔、安陵莫器𠂔狎	莫器邵(昭)甕、左司马𠂔
□陵	攻尹产、少攻尹惑	攻尹产、主尹𠂔
兼陵	攻尹怠与乔尹黄𠂔	攻尹快、乔尹𠂔
株阳	莫器邵寿君与乔差(佐)癘	莫器寿君、安陵公𠂔
黄阳	司马寅、黄辛、宋癘	司马寅、竟𠂔
鄱	连器竞𠂔(快)、攻尹𠂔、波尹宜	连器竞快、攻尹舒𠂔
正阳	莫器达、正阳公𠂔、少攻尹哀	司马达、芙公𠂔
阳陵	连器达、大𠂔尹足	司马达、右司马𠂔
新都	莫器胜、新都桑夜公达	
州	莫器疥、州司马庚	

除去新都、州两地^①,甲组中接收贷金的官员共有 20 人,同时在乙组中重复出现的有 8 人,仅仅占到 40%,可以说接收贷金的人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假如甲组是贷款计划,乙组是贷款到账记录,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对于甲组记录来说,尚未到账的借贷款只需简单标注某地贷金多少鎰就完全可以了,为何要地方官员逐个签收?地方官员如何签收一笔根本没有到账的款项?签收贷金不仅是地方官员表示足额收到款项的证明,同时也是未来收回这些贷款的保证书。将来出现责任事故时,前后两次签收同一笔款项的官员很可能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该依据哪一组记录来厘清责任?从包山楚简法律文书所反映的严谨程度来看,楚国中央政府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漏洞。

综合以上两点,甲、乙两组简文记载的应该是两笔独立的贷款。至于贷款的用途,接下来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余種”词义辨析

两次贷金的用途,目前学界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以后德俊、罗运环、王颖几位先生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贷款单纯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刘信芳先生根据贷出款项的“越异”是楚国救灾机构的推测,认为贷款是紧急发放用以救灾的性质^②。罗俊扬与李学勤先生都注意到两次贷款用途有不同:第一次贷款是用来余种没有异议;李学勤认为第二次贷款用于灾荒救济,罗俊扬则未作推测。

事实上,两次贷款用途的差别在贷金文书中表现得很明显。甲组第一枚简(简 103)记载楚国司马根据楚王的命令兼陵公等人为鄱鄱地区贷出黄金之时,特别在简末注明“以糴(余)種”。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贷出的黄金都是用于买入“種”。接下来的简 105 至 114,兼陵等 10 个地方单位各自签收了这笔贷款,其文书记录的基本结构(辞例)大致可以抽象为以下公式:

某地+某官员+为某地+贷越异之金若干+以糴(余)種

值得注意的是,“以糴(余)種”字样在每枚简末都曾出现,除了用来表明贷款用途,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将贷金挪作他用,保证专款专用。再来看乙组简文,首简并未出现“以糴(余)種”字样,地方签收的简文结构也简化为

某地+某官员+为某地+贷越异之金若干

显然第二次贷金并未限定用途。所以罗俊扬与李学勤两位先生对两次贷款差别看待的方式,更加

① 两地都未曾见于乙组贷金记录。
② 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民国九十二年,第 98 页。

接近于事实。但是,第一次贷款的用途真的是“籴种”吗?

简 103 末尾三字,原考释者隶定为“以糴種”,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于“種”字,原考释者直接释读为“種(种)”^①。此后的研究者都采纳了此种意见,并未产生任何怀疑。但查阅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后,我们恐怕不能作简单的结论。

虽然在很多文献中“種”与“種(种)”字可以相通,但在某些特定场合“種”仍可以用来指某些谷物(作为食物而非种子用途)。例如《周礼·天官·内宰》云:“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種稷之种而献之于王。”郑玄注云:“先种后孰(熟)谓之種,后种先孰(熟)谓之稷”“種,直龙反,本或作重,音同,案如字书禾旁作重,是种稷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则反之。”種、种二字并举,可见在撰写者看来完全是独立的两种意思,種更偏重于指某些谷物,官员所进献的是它的种子。这种例子在《周礼》中不止一次出现。《地官·舍人》云:“以岁时县種稷之种,以共王后之春献种”,《地官·司稼》云:“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稷之种”。

另外,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篇中,種字曾两次出现,含义也不相同。一例是“至(制)约者(诸)侯,鬻(绝)種(种)忒(侮)眚(姓)【简 53】”。鬻種连读,種同“种”,“鬻(绝)種(种)”表示种族的灭绝。另一例是“飢(食)不童(重)昧(味),朝不车逆,種不粃(穀)米,饗(宰)不折骨【简 21】”。这是一个排比句式,食不重味、朝不车逆、宰不折骨,都是用于形容生活简朴的。“種不粃(穀)米”的意思显然应该与其他三句相同。粃,原释读者读为“穀”是非常正确的。《说文·穀部》:“穀,粃米一斛舂为九斗也”。睡虎地秦简《仓律》简 42 载:“【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为糲(粃)米一石;糲(粃)米一石为鑿(糲)米九斗;九【斗】为穀米八斗。”粃米是经过脱壳后的糙米,《说文》认为 10 斗粃米可舂成 9 斗穀米,《仓律》则认为只能舂成 8 斗,暂且搁置出米率的些许差异,穀米是更加精细的米是没有问题的。種,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它与“舂”相通,“種不粃(穀)米”意思是即使舂米也不会铺张浪费地舂为精粮,这是原考释者的释读^②。另外一种就是上文《周礼》提到的晚熟的谷物。不论采用哪种解释,種都不是指种子,因为用种子加工成精米从逻辑上说不通,与上下文讲求生活节俭的语境也不融洽。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篇楚简《容成氏》之中,種的字义也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只有种子的含义。我们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为贷金简中“種”只是指种子,用来指代谷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贷金的购买力分析

不论是用作食物还是用作种子,“種”所指的都是谷物,仅仅从贷金简文的“以糴(籴)種”记载并不能给出答案。后德俊与陈伟两位先生已经从贷款的月份推测了贷款用途。后德俊先生认为第二次贷金是贷款实际下发执行之时,其月份“夏柰之月”相当于今农历六月,正好由政府购买即将成熟的水稻,经选育后用以推广良种^③。陈伟先生根据“秦楚月名对照表”与贷金简月名对照,认为简 103 记录的贷出黄金的“享月”(夏历三月)大约是水稻播种季节,简 104 记录收回黄金的“屈柰”之月(夏历十一月)已经在水稻收获之后,所以简文记载大意是春耕时贷款给各地购种,而收获之后还贷^④。李学勤先生据此推测当时楚国不少地方发生荒歉^⑤。以上学者都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足以为贷金问题提供借

① “第一组共 17 枚简(简 103-119)。这组简是关于……令有关官员为鄙鄙之地贷 异之砂金以糴种的记录”(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10 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66 页。

③ 后德俊:《“籴种”考》,《中国农史》1995 年第 4 期。

④ 陈 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 页。

⑤ 前揭李学勤文《楚简所见黄金货币及其称量》。

鉴,而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贷金的购买力)对贷金用途问题进行讨论。

甲组接收贷金的 10 个地方行政单位,绝大多数都被认为是楚国的县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①。这 10 个地区的政府,其中 6 个向中央贷款金额完全相同,都接收了 7 镒黄金。那么 7 镒黄金对于一个县的人口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当时黄金与粮食的比价、县的人口与田亩、人均口粮消耗量等数据,就能估算出 7 镒黄金是否够一县人口作为口粮,也就知道第一次贷款的“種”的属性究竟是食物还是种子了。

战国时代楚国粮价记载在文献中非常罕见,所以很难得知楚国粮食与黄金的比价^②。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保存了秦人占领荆楚时期的部分价格资料,我们可以借助它们来进行估算。值得指出的是,睡虎地与里耶秦简的时代已经晚至秦始皇时期,距离包山楚简贷金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 322 年)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很多要素会发生变化,因此接下来的估算仅仅是以秦始皇时期的数据提供一种参照,真正的测算还是有赖于将来出土更多的地下文献。

楚国的黄金是称量货币,从贷金简和包山楚简的其他简文来看,常用的称量单位是“镒”与“两”。考古出土的天平砝码实物提供了楚衡制方面的信息。1945 年长沙近郊出土一套 10 枚青铜砝码,其中有“钧镒”铭文。这组砝码中最大的一枚重量为 251.3 克,被认为是楚国 1 镒的衡值,根据已出土的多组砝码来推断,1 镒的衡值大概在 251.3–255 克之间。而根据 30 件秦始皇诏书秦权推算,秦制 1 斤大约在 250–260 克左右,与楚衡制 1 镒几乎相等^③。所以在推算时我们可以直接将 1 镒黄金换算为 1 斤。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简 83 正记载:“马甲一,金三两一垂,值钱千九百廿,金一铢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卅。”^④秦时 1 斤等于 16 两,1 两等于 24 铢^⑤,所以按照岳麓秦简《数》推算 1 斤黄金的价格为:24 钱×24×16=9216 钱。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简 143 记载:“𡗗(系)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被拘系服城旦舂之劳役者,若由公家提供伙食,则每石粮食收 30 钱。简 133 亦载:“有罪以赏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由公家提供伙食则需每日多扣的 2 钱就是一天的口粮标准,30 天合 60 钱,刚好可买 2 石粮食。这与《仓律》简 49“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的记载可以相合。但 1 石粮食 30 钱是秦政府规定的价格,很可能会比实际交易价格低。岳麓秦简《数》148 正、205 正和 152 正分别记载:“米贾(价)石五十钱”^⑥、“米一斗五

① 陈伟先生最先使用司法职权、名籍管理、职官设置三项标准认定楚国的县。从司法职权来看,县府一般是古代最基层的治狱机构,主持狱讼的地方政区因而被认为是楚县。著录并保存民众名籍的地方官府,职能与秦汉的县相当,因而可以被识别为楚县。职官设置与其他楚县相当的地方政区,也应认定为楚县。其后,颜世炫、吴良宝等先生将相关标准拓展为多条。接收贷金的 10 个地方政区都被认定为楚国与县同一级的政区。相关研究参见: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 94–101 页;颜世炫:《包山楚简地名研究》,1997 年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114–115 页;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4–166 页。

② 丁邦友先生对战国秦代粮价曾做过整理与研究,参见氏著《〈管子·轻重篇〉粮价考略》(《安徽史学》2006 年第 6 期)。

③ 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69–171 页;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83 页。

④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第 78 页。

⑤ 1979 年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出土两件战国金饰牌,乃是秦国制造,以秦国文字书写之铭文分别言曰“一斤二两廿朱(铢)少半”和“一斤五两四铢少半”,经实测金饰牌分别重 330.067、292.522 克,经折算一斤分别为 249.3、248.3 克,一两分别为 15.58、15.52 克,一铢为 0.649、0.647 克,据此可知,秦一斤折合 16 两,一两折合 24 铢。参见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考古》1982 年第 5 期)。

⑥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111 页。

钱”(注:折合一石五十钱)^①和“米贾(价)石六十四钱”^②。民间交易的米价在每石 50 钱至 64 钱之间波动。某些时期在某些地区米价还会飙升过百钱。里耶秦简 8-1743+8-2015 正、背记载了秦迁陵地区米的价格:“[秦始皇]廿六年八月丙子,迁陵拔,守丞敦狐诣讯般乌等,辞各如前。鞫之:……受米一石,赃值百卅。”^③秦始皇 26 年(公元前 221 年)迁陵地区 1 石米的价格一度达到 140 钱。这么高的粮价大概与秦统一全国前夕的紧张局势有关,应该并非常态。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粮价在 30 至 80 钱之间波动才是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排除掉 140 钱的特殊案例,采用粮价居中的数据(每石 50 钱),则 1 斤黄金可以换来 184.32 石粮食。在包山楚简贷金简中,贷款数额出现最多的是 7 镒^④,这个数额大概能够代表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贷款数目。7 镒黄金,折合约 1290 石粮食。那么,千石数量的粮食对于秦汉的高级官吏来说不过是一人一年的俸禄而已^⑤,对于战国时代楚国一个县的人口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呢?

战国时代人们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传世与出土文献中找到线索。《墨子·杂守篇》曾记载:

“斗食,终岁三十六石。参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有学者从全文文意推算,以“日再食”(每日两餐)计,所谓斗食、参食、四食、五食、六食,分别指每餐口粮为 1/2 斗、1/3 斗、1/4 斗、1/5 斗、1/6 斗,每月口粮分别为 3 石、2 石、1.5 石、1.2 石、1 石。以上廩食标准在出土秦简中也能见到几乎相同的记载^⑥。

睡虎地秦简《仓律》简 50-52 载^⑦:

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母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之,禾月半石。

由此条文律文,可以看到秦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口粮有着详细的划分,详情如下表:

表 1:

身份	性别年龄	月禾	参照《墨子》
隶臣	成年男子	2 石	参食
隶妾	成年女子	1.5 石	四食
小城旦、隶臣作者	少年(做重体力活者)	1.5 石	四食
小城旦、未能作者	少年	1 石	六食
小妾、舂作者	少女(做重体力活者)	1.25 石	五食(1.2 石)略强
小妾、未能作者	少女	1 石	六食
婴儿之母(无)母者	婴儿	0.5 石	
婴儿与母冗居公者	婴儿	0.5 石	

①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147 页。

②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114 页。

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85 页。

④ 甲组简中有鄢、郢陵、株阳、莨阳、郢、州等 6 地贷款 7 镒(总共有 10 个地方单位贷款);乙组简中也有鄢、莨阳等 2 地贷款 7 镒。

⑤ 《商君书·境内》有“千石之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亦常见官吏拥有“千石”“比千石”的秩级。

⑥ 于振波:《“参食”考辨》,载于振波著《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45-351 页。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释文注释部分第 32 页。

月禾即是每人每月的口粮消耗,根据性别年龄逐次递减。《仓律》虽然是秦政府为隶臣妾、城旦舂等服役人员制定的月禾廩食标准,但是对于了解当时普通人群的粮食需求具有极高参考价值。由上海博物馆藏商鞅铜方升等多件秦量器的测量结果,可知秦国的 1 升大致可以定为 200 毫升,秦国的量制为:10 升=1 斗,10 斗=1 斛^①。汉代容量单位均以十斗为斛,但在实际运用中又常常出现斛与石通的例子,有学者经过实测西汉容器上“容 x 石,重 x 斤”的刻铭,石与斛为同一级容量单位^②,也有学者通过传世与出土文献考证,一石确指十斗容量^③。黄展岳先生根据《仓律》《说文》《九章算术》中的记载,将秦汉粮食分为黍谷与稻谷两种不同情况,折算出两者分别舂为粳米和粳米后不同的出粮率:黍谷 2 石舂为粳米 12 斗,稻谷 2 石舂为粳米 10 斗。再结合实测 2000 毫升小米(或大米)重量皆为 1.755 公斤,从而推算隶臣(成年男性)月禾二石最终得到的粮食重量,黍米为 21.06 公斤,稻米为 17.55 公斤,平摊到每天分别是 0.7 公斤和 0.586 公斤^④。所以秦律规定的每日粮食供应量是符合一般生活常识的。《仓律》的供应标准与《墨子·杂守》记载基本相同,反映这种廩食标准可能在当时并非仅秦国施行,而是比较普遍的通用标准。

以上只是战国时代粮食消耗的理论标准,若要据此推算 1290 石粮食可供多少人口食用,并不能简单采用成年男性的口粮标准,还需要考虑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多方面因素。战国时代的各国人口数尚且没有记载,性别与年龄结构更无从谈起,那么从哪里可以找到这类信息呢?看来只有另辟蹊径。我们的设想是,从出土简牍记载的最小社区“里”提取里中人口的相关数据,放大到县域的规模进行推算,应该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里耶秦简中有南阳里登记户籍的简牍(学界一般称之为“户籍简”),其中还包含了性别与年龄等多种人口信息,我们可以借助秦国家定的口粮标准估算南阳里乃至一个县的口粮消耗情况。

按照《仓律》廩食标准,结合里耶秦简“户籍简”中的部分民户的户籍资料,我们可以大致估算迁陵县南阳里的粮食需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2 迁陵县南阳里部分人口与月禾表^⑤

序号	简号(完简/残简)	成年男子	成年女子	未成年男子	未成年女子 与老年女子	隶臣妾	家庭总人口 (人)	月禾(石)
1	K27(完)	1	1	1	1	臣 1	5	8.25
2	K1/25/50(完)	1	1	3	3		8	11.75
3	K28/29(完)	1	1	1	1		4	6.25
4	K17(完)	2	1	2	2		7	11

① 参见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66-169 页;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 148 页。
②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 25 页。
③ 杨哲峰:《两汉之际的“十斗”与“石”、“斛”》,《文物》2001 年第 3 期。
④ 黄展岳:《关于秦汉人的食粮计量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该篇又收录于黄展岳:《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9-174 页。
⑤ 陈絮先生曾将里耶秦简“户籍简”整理成“迁陵县(道)都乡南阳里户籍事类综览表”(陈絮:《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本表在其基础上编绘而成。另外有几点需要说明:简k38/39 以下诸简残断严重,已经不适合作为人口数据采纳,故本表未收录。因原简文第五栏记录该户拥有的臣妾奴隶文字时有不清晰,本文统计时一概以成年男性口粮来计算。原简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统计并未注明是否婴儿,本表一律按照未成年“小”的标准计算。第一栏中可能有老年男性但并未标注出来,本表仍按照成年男性口粮计算。老年女性依照原简与未成年女性一起计算口粮。未成年男女皆采用较高的口粮标准(“小城旦、隶臣作者”“小妾、舂作者”),即 1.5 石与 1.25 石。

续表 2:

序号	简号(完简/残简)	成年男子	成年女子	未成年男子	未成年女子 与老年女子	隶臣妾	家庭总人口 (人)	月禾(石)
5	K4(残)	2	2	2	2		8	12.5
6	K33(残)	1	1	0	0		2	3.5
7	K42/46(完)	1	1	1	1		4	6.25
8	K30/45(残)	2	2	1	1		6	9.75
9	K13/48(残)	1	1	1	1		4	6.25
10	K8/9/11/47(完)	1	1	1	1	2	6	10.25
11	K5(残)	1	3	1			5	8
12	K7(残)	1	1	1	1	1	5	8.25
13	K31/37(完)	1	1	2	2	1	7	11
14	K43(完)	2	2	2			6	10
15	K2/23(完)	3	2	4	1	臣 1	11	18.25
	小计人口(人)	21	21	23	17	6		
	小计月禾(石)	42	31.5	34.5	21.25	12		
	总计人口(人)						88	
	总计月禾(石)						141.25	

南阳里户籍简登记的民户大约有 25 户,由于部分简牍残损严重,此表仅统计了其中较为完整的 15 户的数据。依据此表统计,在南阳里的 15 户居民中,总计 88 口,月消耗粮食 141.25 石。根据总人口计算出每户的规模,平均每户 5.9 口^①,平均每口每月需要粮食约 1.6 石。前文曾计算 7 镒黄金可购买 1290 石粮食,按照南阳里的口粮消耗,大约可供应 804 人的一个月口粮需要。如果这些贷金是用于救济灾荒,通常采用施粥的方式可以降低一半左右的口粮标准,那么 7 镒黄金则可以在一个月内救助 1608 人。

战国时代一个县的人口是多少,传统文献没有相关记载。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战国时期各国总人口数量,也只能依据西晋学者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周成王、庄王时人口数推算,或是根据当时文献记载并不准确的各国兵力数推算,并没有一个相对可靠的数字^②。在此背景下,对于一县之人口的讨论很难直接开展。那么我们只能借用西汉的县域户口资料。2004 年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 53 号木牍,直接记录了汉武帝初年江陵及周边 9 个县、道、邑、侯国的人口数,是相当系统的县域人口资料^③。

表 3 松柏汉简记录江陵及周边县、道、邑、侯国人口数表

县名	人口	县名	人口
江陵	19735 人	宜成	22759 人
临沮 ^④		安陆	2220 人
沙羨	2662 人	州陵	2091 人
显陵	1608 人	便侯国	8447 人
郢侯国	17937 人	襄平侯中庐	6708 人

① 黎明钊先生曾根据此户籍简计算出每户人口数为 6.0,与本文相当接近。参见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 1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91-297 页。

③ 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 209-212 页;彭浩:《读松柏出土的西汉木牍(三)》,简帛网,2009 年 4 月 11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017)。

④ 该县未登录总人口数。

由松柏木牍记录可以看到,各县级行政区人口数并不平均,大的县邑如江陵、宜成多至2万,最小的县显陵仅有不到2千人。这些县以人口数可以划分为三个等次:大县人口大致在18000至22000左右(江陵、宜成、郢侯国),中等县在6000至8000左右(便侯国、囊平侯中庐),小县人口低于3000(安陆、沙美、州陵、显陵)。

综合以上数据,7镒黄金(相当于1608人每月的救助额度),对于人口低于3000的小县而言,可以救助超过六成的人口;对于6000至8000人的中等县,可以救助两成以上的人口。考虑到政府的灾荒救济钱物通常用于救急,并非全民救济,这样的救助规模是可以接受的。至于1万人以上乃至2万人的大县,贷金简中还记录有11镒4两、32镒黄金的救助额,应该是足以应付了。

假如贷金是用于农业贷款购买种子,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此种可能性,但至少有一个疑问难以回答:获得7镒黄金贷款的6个县级政区,一般说来每个县的田亩数量不可能相同,为何获得贷款的数额却一样?或者也可以换个说法,为何不根据登记在册的田亩数量划分不同的贷款额度?在相同的总贷款额之下,相邻县的农户拿到应该是标准不一的贷款,这种做法容易引起纷争。本来种子贷款是件好事,也会演变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坏事。主持发放贷款的中央政府官员令尹、司马一千人等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以上分别从用于粮食救济的方向,对楚国中央政府的贷金数额进行数字估算。估算结果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一次贷金的用途应该是为各地购买粮食谷物用于救济。

再结合后德俊、陈伟等先生分析的贷金时间来看,甲组简第一次贷款是在“享月”(夏历三月)即春季下发的,此时距离夏收还有几个月时间,所以需要“糴种”购买粮食救济灾荒。所以“种”还是释读为粮食更加合乎情理,而不是读为“种”字。这笔贷款原本要求地方政府在“屈柰”之月(夏历十一月)归还(赛金),可能是指望地方政府以秋收之后的税收来弥补。但后来大概发现灾情较为严重,遂不再要求归还贷款,故而甲组简末尾都写有“迄期不赛金”字样。另外中央政府还紧接着在下一个“夏柰”之月即夏历四月,又安排第二次贷款。乙组简第二次贷款的用途应该是为地方纾困,用于购买多种救灾物资,所以贷款文书并未强调黄金必须限定于“糴种”的用途,以方便地方政府灵活运用贷款。或许由于灾情较重,所以第二次贷款干脆未限定归还(“赛金”)的时间,也没有任何归还的记录附在简末。

有关战国时代楚国的出土文献中很少出现账簿类的记录,因而包山楚简贷金简是非常珍贵的材料。贷金简中的各种数字也因此缺少了其他的资料的参照,很难从中解读出更多的信息。我们试图借助战国晚期、秦代乃至西汉早期的同类文献,建立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参照系统,以帮助这类文献的解读。虽然这个参照系相当粗糙,但毕竟是个起点,未来还可以不断修正。同时,解读的过程也具有开放性,比如在追寻“糴种”的用途时,我们对于战国时代楚县的人口规模、粮食消耗也能产生一个大致的概念。随着新的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希望终有一天先秦史也能迈入计量研究的领域。

[参 考 文 献]

- [1] 后德俊. “余种”考[J]. 中国农史, 1995, (4).
- [2] 李学勤. 楚简所见黄金货币及其称量[A]. 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C].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 [3] 罗运环. 包山楚简贷金简研究[J]. 武汉金融, 2005, (10).
- [4] 陈 伟.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 [5] 丁邦友. 《管子·轻重篇》粮价考略[J]. 安徽史学, 2006, (6).
- [6] 张世超. 容量“石”的产生及相关问题[A]. 古文字研究(第21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7] 黄展岳. 关于秦汉人的食粮计量问题[J]. 考古与文物, 1980, (4).
- [8] 丘光明、邱隆、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9] 黎明钊. 里耶秦简: 户籍档案的探讨[J]. 中国史研究, 2009, (2).
- [10] 陈 絮. 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J]. 历史研究, 2009, (5).